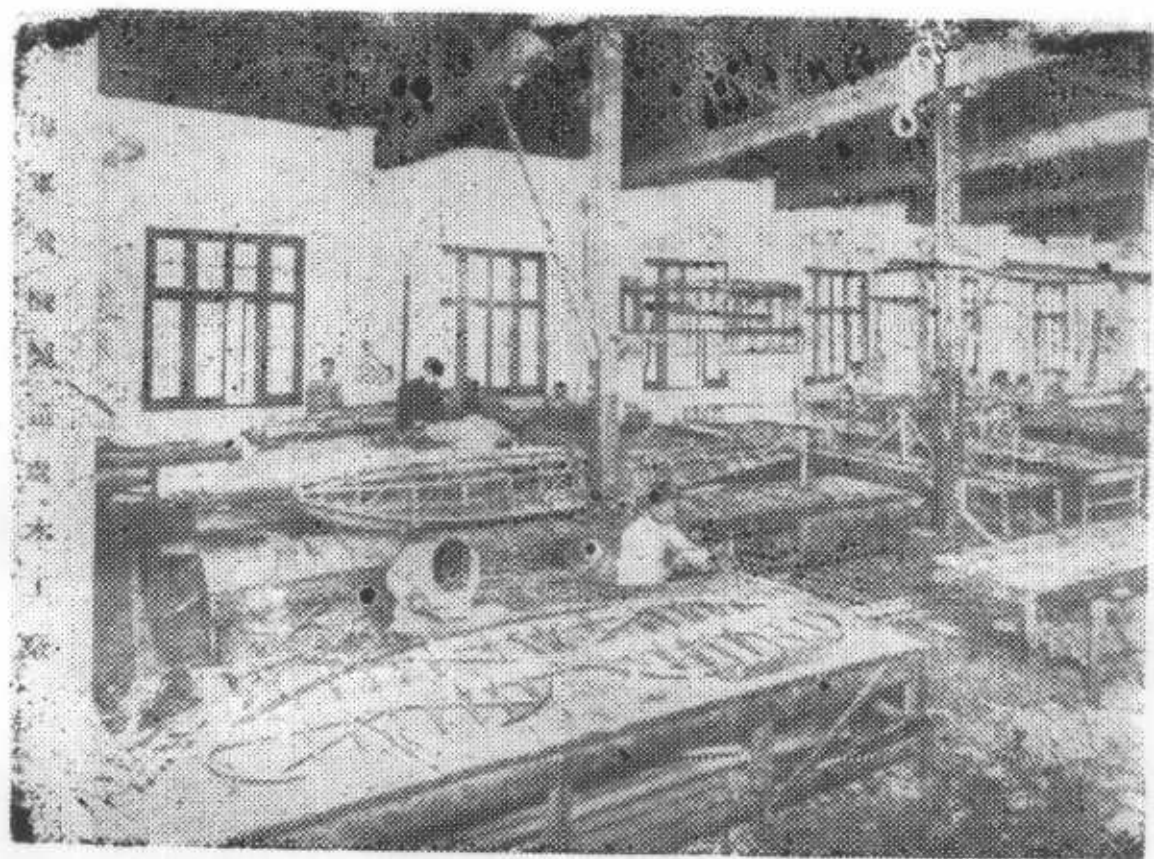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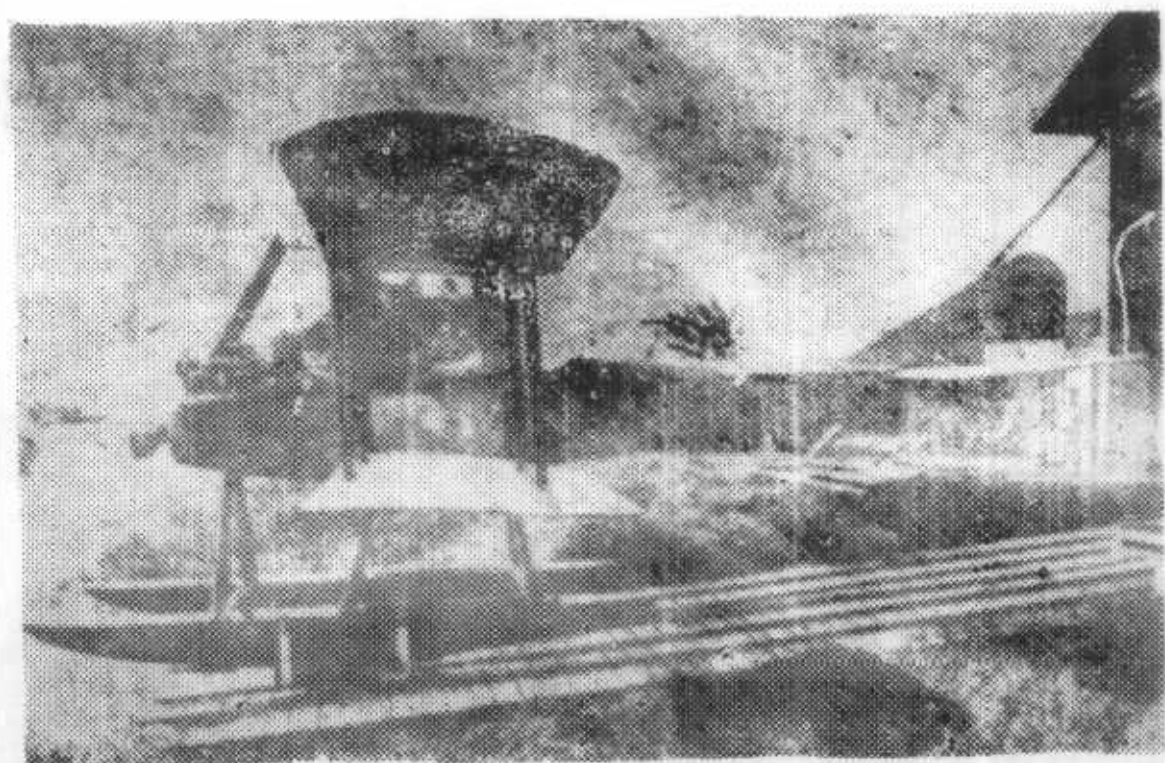
陈庆年先生遗相



丁 閣 公 先 生 遺 相



海 军 部 飞 机 制 造 处



乙式水上飞机

目 录

茅山地区的反“清乡”斗争·····	范征夫(1)
何应钦在江苏省政府欢迎会上谈贪污·····	史 勤(15)
宣侠父镇江避难记·····	蒋超雄(18)
江苏省政府主席王懋功二三事·····	刘平江(29)
解放前的江苏省建设厅(上)·····	董赞尧(39)
为祖国添翼的人·····	杭依特·石林(59)
<u>丁闾公传略</u> ·····	丁永选(67)
<u>叶玉森先生事辑</u> ·····	柳曾符(75)
醉人为瑞·····	赵 同(87)
毕生热心公益的朱中孚·····	陈约三(101)
孙传芳之兴衰·····	黄 政(105)
致力金融三十五春·····	朱博泉 王季深(112)
二十年代丹徒县教育会活动片断·····	杨奇璞(157)
二十年代镇江教育界的一场风波·····	闻谅直(164)
人人照相馆与崇华小学·····	李 之(169)
镇江田赋杂谈·····	杨方益(172)
镇江“一贯道”真相·····	渐 佳(185)
<u>《潢山乡人日记》选摘</u> ·····	明 光(197)
江苏书院志初稿(下)·····	柳诒徵(231)

茅山地区的反“清乡”斗争

范 征 夫

茅山，因“山形曲折似句字”，原名句曲山。西汉时，有陕西人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来此结屋修道，所以改名为茅山。茅山并不高，海拔372米，周围约150华里。它之所以出名，一是由于宋、明两朝的皇帝在山顶上建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九霄万福宫，周围还建有大小道院 257 处，使之成为我国东南地区的道教中心。每年夏历正月十五到三月十八，是香汛时节，全国各地来茅山进香，朝拜三茅真君的约有数十万人。二是因为抗战爆发后，新四军一、二、三支队在陈毅、粟裕、谭震林将军率领下，挺进苏南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茅山抗日根据地，并由此出发，东进抗日，开辟了苏州、常熟、江阴、无锡等广大地区；继由茅山地区北渡，挺进到长江以北，打开了华中敌后抗战的新局面。从此，茅山作为我党领导的敌后19块根据地之一而名扬海内外。

1943年，党领导茅山军民，与日伪军的残酷“清乡”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搏斗，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完全胜利。虽然时间已经过去40多年，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谨以此文献给抗日战争五十周年纪念日和在反“清乡”斗争中牺牲的战友。

日伪垂死挣扎 密谋合演双簧

日伪军为什么要在茅山地区进行“清乡”？这得从头说起。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大举侵略中国，狂妄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七七”芦沟桥一声炮响，震醒了“东亚睡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奋起抗战，使日军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到了1943年，中日战争已打了六个年头，进入相持阶段；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也由战略防御转为全面战略反攻；苏联红军已打到聂伯河；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在这样的形势下，日伪军为了进行垂死的挣扎，就用“清乡”残酷手段，妄图一举消灭长江下游地区新四军主力，以巩固其占领区的统治，防止盟军在我国沿海地区登陆，防止我军最后反攻。

另一方面，茅山根据地处于京沪杭三角中心地带，它犹如一把钢刀，架在敌人的脖子上，日伪在京沪杭铁路沿线据点不断遭到袭击，不仅威胁日伪首都南京的“安全”，也使中国最大城市上海“不得安宁”。这使日军驻华派遣军头目及汪伪政府大小官员们心惊肉跳，坐卧不安，他们视茅山新四军为“心腹之患”，必欲及早“铲除”。因此，日伪在1941年和1942年分别对苏州地区和上海近郊“清乡”之后，于1943年3月起，对茅山地区进行残酷的“清乡”。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畑俊六大将声嘶力竭地叫嚣，“要肃清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共军，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汪逆精卫也鹦鹉学舌，在镇江地区“清乡”动员会上鼓噪：“此次清乡目的，是清除共党，实现大东亚共存共荣。”一个说，“要彻底开发和获取国防资源”。一个应声道，“要振兴经济，安定民生”。很明显，日伪在茅山地区“清乡”，除了上述原因外，妄图从原来的点线占领，进而全面控制所有乡村，彻底实施奴化教育，搜括民脂民膏，以达到其“以战养战”、“以华制华”之罪恶目的。

茅山军民 沉着应战

早在1938年7月7日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在陈毅同志亲自领导下，茅山军民建立了镇（江）丹（阳）金（坛）句（容）四县抗敌总会。以后，又逐步建立起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工会、农会、青年会、妇女会等各种抗日救亡组织，也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群众抗日情绪十分高涨。1941年皖南事变后一段时间，茅山军民在失去主力依靠的情况下，独立奋战，打退了敌伪顽三方的夹攻，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因此，对于日伪的“清乡”，茅山军民是有思想准备的。

1942年秋季，中共茅山地委书记吴仲超同志就向茅山各级党政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华中局及苏皖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同志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专门作的《苏南反清乡斗争的总结报告》。陈毅同志在报告中深刻指出：“清乡与一般扫荡不同。要清楚认识，扫荡带短期性或季节性，带着战术和战役性质，而清乡是长时间的篦梳，其目的不仅在于打击我主力，而且使我之地区彻底伪化，故集中力量软硬兼施，以彻底破坏我地方党及民众团体，故敌伪清乡之特点，是带有战略性质的。”通过传达讨论，茅山广大干部清醒地认识到敌伪“清乡”不单纯是军事行动，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全面进攻。因此，反“清乡”斗争不是短期的，应有长期坚持的打算。

对于敌伪军扫荡，茅山军民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但对于如何对付敌伪篦梳式的“清乡”，有的人感到缺乏把握，甚至存在一些疑虑。茅山地委负责同志及时传达了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少奇同志指出：“日伪清乡有其弱点，就是只能集中在一、二个小地区进行，不能同时在一切地方进行；只能在一定时期‘清剿’，而不能长期地在一

个地区‘清剿’；我们反对日伪‘清剿’的较好对策，是主力预先转移，跳出其‘清剿’圈，并以少数武装人员，利用很好的群众关系和统战关系，分散坚持原地斗争，并打击叛徒、特工，待敌人‘清剿’过后，再恢复原来地区的工作。”刘少奇同志这段精辟的指示，是克敌制胜的思想武器，使我们对坚持反“清乡”斗争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1943年3月，中共茅山地委发出了《关于反清乡斗争的指示》：“在坚持原地斗争总的方针下，动员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提高斗争积极性，打破敌人的清乡计划，作长期坚持的一切准备。为此，提出以下十条，作为全党最紧急的斗争任务：在党内外作深入反清乡动员；打破敌人清乡计划；积极进行反奸细、反特工、反投降的斗争；以区为单位，建立短小精干的便衣武装；向边区敌占区及一切空隙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建立秘密支部单线联系；在敌人清乡区及封锁区留最少干部，长期坚持；加强敌伪军及统战工作；迅速完成解粮征收；加强情报交通工作。”

在敌伪“清乡”前，茅山各级组织做好了应变工作，所有党组织和群众团体的成员转入秘密状态；撤走面孔“红”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一些老弱和女同志暂时回家隐蔽；精简党政机关，把原来的镇江与丹阳两县合并为镇丹县，将原来的18个小区合并为8个大区，每个区挑选七八人到十几人的精干便衣武装人员坚持原地斗争；主力部队只派一二个连的武装在封锁线两侧活动，基本撤到“清乡”圈外开辟新区，伺机打击日伪军。

深水之“鱼” 穿破“密网”

敌伪宣布“清乡”开始是1943年3月，但从2月21日起，日伪精锐部队2000余人，即先由西向东，然后再由东向

西，反复扫荡我茅山中心地句容东部地区，袭击我手无寸铁的苏南财经处工作人员。2月22日，日伪军先后在延陵、麦溪、丁庄、九里、小吕庄、行官庙、前村、上会、庄城桥、吕邱、潭头、马陵、白兔等处安下据点。茅山地区的敌伪据点，从原来的51个增加到301个，日军兵力从原来的3900余人增加到7300余人，伪军兵力（包括保安队、警察部队）也增加到5000余人。

日伪在“清乡”区强征民伕，砍伐竹子，于3月15日完成了一条从镇江句容公路起，到苏州木渎、横泾止的长达650华里的竹篱笆封锁线。竹篱笆高达2米，两边挖有深水沟，每隔一二里路就有一个检问所，筑有碉堡岗楼，有日伪军把守，盘查来往行人。在封锁线内的“清乡”区更是碉堡林立，岗楼密布，如同梅花桩，日伪军和伪自警团日夜巡逻，中间空隙地带很小，我便衣武装人员活动非常困难。日伪军在“清乡”区烧杀淫掠，暴行令人发指。当时，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同志曾发表谈话，公开揭露说“清乡区内，敌汪铁蹄所至，残暴恶行随之，掳掠不分贫富，十室九空，奸淫竟及女孩老妇，极尽兽性之能事……复采取乱烧乱杀政策，清乡区内被毁之民房触目皆是。”

更为严重的是，从1943年3月到5月，日伪继大扫荡及完成封锁线之后，在茅山“清乡”区内反复进行军事“清剿”。这是日酋畑俊六从蒋介石对共产党的五次军事“围剿”中学来的一套毒辣战术，被畑俊六称之为篦梳式的“清剿”。其手段是，每天以大批日军化装成便衣，携带轻武器及冲锋枪，从各据点出发，以三五十人为一队，三五人为一组，齐头并进，拉开大网，全面搜索。同时封锁一切交通路口和桥梁，挨村挨户去反复搜查。这就好比一把篦子，在人

的头上梳来梳去。一发现目标，即发出信号，四面包围。日伪还在四乡贴出布告：“通新四军者杀，窝藏新四军者杀，知情不报者杀”。我镇丹县太平区农会干部顾腊庚，就因为拒不说出我方便衣武装人员的隐蔽地点，而遭到延陵敌伪残酷毒打后杀害。

为了避开日伪“清剿”锋芒，减少损失，也使人民生命财产少受损害，那段时间里，我和镇丹县太平区坚持反清乡斗争的武装人员一般不进村庄，不住民房，白天分散隐蔽在麦田、菜地、芦苇丛中，晚上露宿坟头或破庙下面的地洞里，避免与敌人正面交火，不死打硬拼，而是寻找机会，捕杀三三两两下乡的敌特奸细，打击敌伪气焰，鼓舞群众斗志。就是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茅山根据地人民始终与新四军心心相连，患难与共，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黑夜里为我方便衣武装人员送饭送衣，不时报告敌伪军动向。根据群众报告，我们及时打击敌人，捕捉特务、奸细。我茅东县武工队镇压了作恶多端的西旻特工组组长吴晓林；镇丹县丹一区武工队处决了密告我军行踪的伪保长钱松林；县区武装还在镇（江）宝（堰）公路上捕获镇江94号特工站特务数名，在丹阳城门外收缴伪警察所枪支。这些，有效地打击了敌伪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延陵政工团头目哀叹说：“新四军扎根于群众之中，好比深水的鱼，到处游来游去，我们不但抓不到他们，反而被他们穿破了网。”群众则编了一个顺口溜：“新四军，日不见，夜出现，来无影，去无踪，抓汉奸，杀特务，闹得鬼子常扑空。”

经过三个月艰苦的反“清乡”斗争，我们坚持反清乡斗争武装人员开始在“清乡”区站稳了脚跟。日伪军则因兵力不足，到处捉襟见肘，那一套“拉网”和“篦梳”式战术失去

了灵验。

消灭“地头蛇” 打击叛国贼

茅山地区土匪帮会武装较多，新四军在茅山建立根据地后，有的改邪归正，参加抗战行列，有的表面上接受新四军领导，但暗地里勾结日伪。后者的头目既是土匪头子，又是帮会首领，还是当地人，熟悉情况，是日伪的争取对象和“清乡”的社会基础，若不及早处理，将会对反“清乡”斗争带来极大危害。

盘据在镇（江）丹（阳）边区的刘鸿奎，就是其中一个。刘原为镇丹自卫总团所属的200多人武装的大队长，拥有大批短枪及轻重武器，率部接受新四军改编后，取得我茅山保安司令部第三营的番号。但他贼性不改，仍私收徒弟，牵牛绑票，敲诈勒索，强占民妻，无所不为，民愤很大。我军对他进行多次教育，但他阳奉阴违，不肯悔改。日伪“清乡”前，他与镇江日军宪兵队长西浦勾结，策划在“清乡”正式开始后接受日军改编为镇江地区“清乡”别动大队，配合日伪袭击我军。为了表示对“皇军”的忠诚，他还让其儿子拜西浦为干爹。为了消除这个隐患，1942年12月6日，利用刘鸿奎为其小儿子办满月酒的机会，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副旅长钟国楚、我茅山保安司令部司令樊玉琳，率主力及地方武装1000余人，分数路进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生俘刘鸿奎匪众，并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枪决了刘鸿奎，当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刘妻孔风英等人均经教育后宽大释放。在反“清乡”斗争期间，茅山地区共处决了暗藏的奸细、特务和作恶多端的“地头蛇”近300人，对扫除隐患，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证反“清乡”斗争的胜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反“清乡”斗争中日伪“扫荡”、“清剿”固然很残酷，但并不十分可怕。最可怕的是内部出现的叛徒，这些人熟悉我方情况，一旦充当日伪鹰犬，破坏性很大，危害严重。1943年5月，正当我茅山反“清乡”斗争处于关键时刻，准备转入反攻之际，我方镇丹县长包建华、镇句县办事处副主任巫孔玺等人，由思想上悲观动摇发展到政治上堕落变节，在汪伪政府行政院副秘书长巫兰溪的策动下，公开叛变投敌，充当汪伪镇江地区“清乡”别动队正副队长，死心塌地为日伪效劳。他们投敌后，第一件事是出卖我打入敌占区做秘密工作的同志，使我镇丹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及丹一区委书记等人被捕。第二件事是以封官等利诱，策动副县长江辅华等一些意志不坚定分子拖枪逃跑，杀害我镇三区区长徐盘荣及区大队长等人，抓捕了许多抗日战士家属，进行吊打刑讯，逼其亲人投降。第三件事是收罗一批流氓地痞，扩充“清乡”别动队成员，进驻白兔、上党等据点，经常下乡横征暴敛，敲诈勒索，当地群众无不切齿痛恨。我方号召茅山军民坚定革命气节，与包、巫叛党叛国罪行展开坚决斗争。同时，组织一个精干的锄奸短枪组，化装深入据点，镇压死心塌地为敌伪卖命的叛徒特务，震慑了一些其他附逆人员。并通过家属工作，争取一些失足者回归。如有个伪“清乡”别动队的大队长，原是我方副区长，在包、巫的哄骗下落水后，懊恨不已，独自跑回来要求我方宽恕，给他以重新做人的机会。镇丹中心县委书记彭炎令其戴罪立功。1944年1月，我军夜袭白兔伪“清乡别动总队驻地时，他里应外合，配合我军消灭敌人，终于带枪来归，重新做人。此役击毙日军联络官中辍野一名，毙俘“清乡”别动队40余人。包、巫如丧家之犬，只身逃命，落得个可耻下场。当初包、巫公开投敌

时，日伪如获至宝，似乎可以挽救他们“清乡的颓势，汪精卫曾亲自到镇江接见包、巫，倍加青睐，日伪报纸也大做文章，大吹大擂：“包、巫率部来归，镇江地区清乡大功告成指日可待”。然而，从包、巫叛变到被消灭不过半年时间，历史无情地嘲笑了这帮逆潮流而动的反动派。

发挥“法宝”威力 化消极为积极

茅山地区物产丰富，土地相对集中，大中小地主士绅较多，还有不少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党的退伍官吏等上中层人士，他们在政治上有一定影响，有的还和新四军有过交往。在反“清乡”中，能否争取他们不出任伪职，不与我为敌，至少保持中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做这一争取工作的有利条件是，陈毅同志在茅山时期，亲自做了他们的统战工作，交了不少朋友，还请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抗日民主政府工作。如有个贡友三，此人是延陵柳茹一带有名的地主，曾任过国民党区乡长，新四军东进后，他表示支持抗日，并经陈毅同志推荐，担任丹阳县第二区区长兼延陵常备队大队长，在1938年下半年到1940年期间，与我方有过一段合作的历史。1941年皖南事变后，因形势紧张，他动摇逃跑，避居丹阳城内。“清乡”开始后，在他的授意下，其儿子贡振钧跑到柳茹据点，准备出任伪丹阳二区区长。我方得悉后，马上由县政府出面写信给贡友三：“先生在抗战初期，曾与我合作，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我们是不忘记这段友情的。对你隐居城内，我们也是可以谅解的。但现在外间纷纷扬扬，言之凿凿，谓令郎贡振钧在你的默许下，将出任伪丹阳二区区长。我们认为这不符先生抗日初衷，希望先生珍惜过去名誉，告诫令郎，以民族大义为重，若助桀为虐，与我为敌，我们将以国法论处，勿谓言之不预也。”这“国法”

两字是有来由的。皖南事变后，贡振钩出任柳茹伪自卫团长，被我新四军短枪队捕获，贡友三得悉后星夜赶到我军驻地，苦苦哀求，看在他的情面，饶其独子一命，并且表示，如他儿子以后再出任伪职，请新四军按国法论处。贡友三自然知道信上借用他以前说的“国法”两字意味着什么。贡友三看了信后，马上复信我方，说已坚决制止其子出任伪职，并保证继续和我方维持关系。这事在延陵一带中小地主中影响很大，他们中有许多人也不敢出任伪职。他们说：“新四军说话算数，我们如果当了汉奸，一定要受国法制裁。”有些开明士绅还带头缴纳救国公粮，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方人员，为我伤病员治疗想方设法。这一切，充分显示了党的统战工作这个法宝的威力。

茅山反“清乡”斗争期间，出现了一批与敌我两方均有来往的两面派人物。对于这些人，不能笼统当作汉奸，不能把他们推到日伪阵营中去，而应具体分析，具体对特。这些人中为数较多的是典型的两面派，他们一面接受伪乡保长职务，帮助日伪征粮收税、编组保甲，另一方面又暗中向我诉苦：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不得不与日伪周旋，并表示接受我方条件，为我方征收救国公粮，掩护便衣武装人员活动。当环境恶化时，他们疏远我方，倾向伪方；当环境好转时，他们又接近我方，疏远伪方。对于这种见风使舵、货真价实的两面派，我们只能利用而不能信任重用。

另一种则是“白皮红心”的两面派。他们原是我方的同情分子或开明士绅，在迫于形势、事先得到我方同意的情况下出任伪乡保长，但是真心向我，假心向敌，表面上为日伪办事，实际上听我差遣，为我刺探情报，传递假消息迷惑敌人；对日伪交办的事尽量拖延敷衍。如镇丹县太平区两面

派保长王三毛，经常出入丹阳城，和伪军伪警打得“火热”，实际上却是受我指派，刺探日伪情况。一次，他打听到丹阳一个伪警察所长要在中秋节回家乡松卜村为其父祝寿，并将随带全付武装的警察近20人。我得此情报后，立即进行部署，在中秋节这天，王三毛配合我太平区便衣武装人员，头戴礼帽，身穿长衫，手拿一包包沉甸甸的厚礼，前往“祝寿”。伪警长兴高彩烈，正当他举杯向满座客人敬酒时，我便衣武装人员举枪喝令放下武器，在一枪未发的情况下，那些喝得醉熏熏的伪警全部成了俘虏。事后，王三毛第一个赶到日军宪兵特工处“报告”，说他们乡下到了大批新四军，吓得日伪军一时不敢轻易下乡。又有一次，王三毛随麦溪伪警察中队长及数十名伪警下乡抓丁收税，遭我太平区大队战士袭击。王三毛故意高叫：“我们被新四军大队包围了！”吓得伪警们惊慌万状，伪中队长只得派他前来和我谈判。结果迫使伪中队长完全接受我方提出的限他们半月内退出麦溪的条件，如期退回丹阳。实际上，那次袭击，我和区大队仅有战士不到10人，演了一出精彩的“空城计”。

还有一种是“红皮白心”的两面派，对我阳奉阴违，口是心非，效忠于敌伪。如镇丹县柳茹镇伪镇长贡某，借交公粮款之机，得知我方区长活动地点，立即向延陵日伪报告，致我区政府、区大队人员遭敌突袭。我区大队查明实情后，黑夜“登门拜访”，将其就地处决，并在镇上贴出揭露其罪状的布告。群众纷纷奔走相告：“新四军没有走。”同时起到了“杀一敬百”的作用，伪乡保长们找到我方，表示决不真心为敌伪办事。

另外，对伪军也不能一律以汉奸看待，要看到日伪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伪军中有的尚有一定的爱国心，经我书面

劝告，表示要“身在曹营心在汉”，决不做没良心的事。如茅东县西旸镇伪军连长吴金标，一次参加日伪军下乡“清剿”，得悉抓到了我方区长等四人，他便在途中先将区长等两人放走，以后又设法将另两人放回，对其上司则谎称是误抓了老百姓。又如茅东县直溪桥伪警察分局长林国钧，一直为我方提供情报，报告日伪装备、人数等。有一次，我方侦察员上街不小心从衣角边露出了短枪，他手下的警察看到后不但不抓，反而悄悄提醒我侦察员当心被日军发觉，使侦察员顺利完成了任务。再如茅麓伪军副连长沙某，不仅经常为我提供情报，还设法为我军购置医药、棉衣等用品。

夜袭延陵镇 火烧封锁线

1943年上半年，在原地坚持反“清乡”斗争中，据不完全统计，共进行大小战斗58次。经过艰苦的斗争，逐步扩大了我方控制的地区，开辟了一部分靠近丹阳、镇江、句容城的近郊地区，征收了大批公粮款，民心日趋稳定，形势逐渐好转。这时，外线新四军主力部队先在封锁线两侧发起猛烈攻势，连续拔除日伪军据点，打得日伪“清乡”机构到处呼号求救，日军疲于奔命。正当日伪军把注意力转向“清乡”封锁线两侧时，我军主力一部以雷霆万钧之势，插入“清乡”区内，于1943年5月1日强攻曲阳据点，5月2日摧毁了日伪中心据点西旸，5月8日又攻克了包巷，全歼守敌。6月初，我军转入全面反攻，连克“清乡”区内13个据点，歼敌200余人，打得日伪军手足无措，惊恐万状，苦于兵力不足，难以应付局面。我军胜利消息不胫而走，“清乡”区内群情振奋。6月22日，我军四十八团及四十七团各一部，在镇丹县太平、九宝两个区大队配合下，乘胜夜袭日伪在茅山“清乡”指挥中心延陵镇据点，战斗打响后不到两小时，